

各种传统中有关东方社会的研究，是关联在一起的。由此，马克思研究的“第三空间”显示出巨大的理论效应。当今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其理论之根也来自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这也是推进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研究的现实实践需要。

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古今之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西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作为东方社会现代转变的现成起点，这意味着有理由对东方社会的现代起点做出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历史分析。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所有制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得出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凸显东方社会的复杂性、特殊性及其发展主体性。受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影响，年鉴学派试图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前溯至15世纪。年鉴学派之后，诸如弗兰克、彭慕兰、王国斌等为东方社会面向现代世界的转化也提供了难得的研究。中国历史学界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开展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近年来李伯重、黄宗智等人有关早期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呼应了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并为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与格局。由此，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有必要向文明渊源及其内在转化方向拓展，在那里，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显然要与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自觉地融合在一起。

三是与开放的德国古典哲学论域关联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既有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拒斥哲学人类学的黑格尔式范式，但近些年国内外学界兴起的康德、谢林、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研究，正在形成以哲学人类学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新态势。这既顺应了从康德传统到新康德主义与现代哲学人类学传统的转化，也在理论上呼应了当代哲学人类学复兴。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转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地说，费尔巴哈类哲学的兴起，虽然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但因其过于强调自然（作为谢林哲学人类学的延伸），实际上走入死局。正是马克思提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①，实现了哲学人类学与社会理论的统一，从而将现代性引入哲学人类学，也将哲学人类学带入现代世界。

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资源与当代哲学人类学关联起来的方向甚多，将得到持续拓展，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作者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领会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拓展

张 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涌现出教科书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性批判、资本逻辑批判等新热点，开辟出市民社会、世界历史、社会发展、交往理论、跨越问题、人的解放等新论域，形成了文本文献研究、对话比较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理论史研究等新路径，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新体系，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理论图景。相比之下，青年学人近年来的研究则陷入“高水平重复”的困境，一方面是学院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水准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却是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不断收窄，依旧驻留在前辈学人开拓的学术疆域，重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

以往研究的既有论域。

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为例，青年学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马克思哲学前史（包括古希腊哲学、近现代政治思想、苏格兰启蒙运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德国浪漫派思潮、青年黑格尔派等），马克思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青年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四大研究板块，取得了诸多富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恩格斯哲学、第二国际时期哲学思潮、列宁哲学等重要环节依旧处于理论史研究的薄弱地带。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沦为“思想的考古”，规避“现实的介入”；即使介入现实问题，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与思潮问题（如数字资本主义、女权主义问题、身份政治问题）研究呈现出“话语过剩”，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学理性阐释则处于尴尬的“失语状态”。

如何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的思想纵深，由此成为亟待我国青年学人回答的迫切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行回顾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史研究旨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而言，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史研究无疑具有典范意义。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史研究，其著名段落至少有四个文本，一是马克思博士论文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理论史阐发；二是《神圣家族》中对唯物主义的理论史梳理；三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观念论的理论史透视；四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系统回顾。马克思的四个理论史研究文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他的理论史研究始终服务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批判。他关注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旨在阐发自我意识哲学而服务于当时的宗教批判。他在《神圣家族》中梳理唯物主义的两大发展脉络，旨在实现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最终是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精英启蒙立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梳理德国观念论的发展史，特别是把康德的“善良意志”学说视为德国市民阶层利益的哲学表达，则是为了说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德意志民族发展相对于英法两国的落后性。他详细梳理剩余价值理论史，把经济学范畴视为经济关系的观念形态，在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史中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最终是为了揭开资本逻辑的秘密。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理论史研究的旨趣是：通过对社会意识的理论史梳理，达到对社会存在的深刻领会。

马克思理论史研究旨趣也决定了马克思理论史的鲜明特征：走出理论史的“意识内在性”，在观念的“外史”中把握观念的“内史”。有什么样的哲学与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史或理论史。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或《哲学史讲演录》就可视为“绝对精神”的理论史。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史问题上的关键区别在于，黑格尔是在绝对精神的“意识内在性”中建构理论史，而马克思则是走出意识内在性，进而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史。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同样都是在社会存在中定位社会意识，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史研究与知识社会学又有何原则性区别呢？事实上，二者的原则性区别在于：知识社会学对构成社会意识的语境和前提的“社会存在”，所采取的是非批判的态度；相比之下，马克思并非无条件地肯定“社会存在”。这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理论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的互动关系”，可以从这样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方面，固然要在社会存在的基本语境中把握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定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社会意识（或者说范畴、观念、理论）作为社会存在批判必然通过的“基本界面”。如何批判性地领会“社会存在”本身，这才是马克思理论史研究的全部旨趣所在。

二

一旦明确了马克思理论史研究的旨趣，即在理论史研究中领会活生生的社会存在，那么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就能打开广阔的思想纵深地带。如果说之前学界的理论史研究主要聚焦于“往前做”，即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追溯至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而再追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史渊源，那么新的思想纵深就蕴藏在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新世界观的诞生地开始“往后做”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一旦转向“往后做”，那么一系列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重大问题便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马克思破解“社会存在之谜”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要求从社会意识进入社会存在，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则是直面社会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由此浮现：如何把握社会存在？如果说以往学界所研究

的马克思哲学革命，旨在揭示“社会意识之谜”，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则旨在揭示“社会存在之谜”，这不啻于一场新的哲学革命。这是因为，社会存在是经由种种中介的总体性存在，而非人们可以直接把握的现成事物，因而具有“谜一般的性质”。这就涉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深刻差别：在传统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直接的对象性关系，客体不需要经由中介，而以直接的方式被人们把握。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中介，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也被复杂的市场交换关系所中介。在此意义上，社会存在的非直接性意味着社会存在的把握必然要经由某种中介。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中介不仅是现代社会真实存在的“现实抽象”机制，而且也有可能是现代社会把握社会存在的“理论滤镜”。现代社会的社会存在不仅具有非直接性，同时也具有高度抽象性；不仅是“具体总体”，同时也是“观念总体”；不仅具有现实的维度，也是反思的产物。这意味着，人们总是借助一定的理论框架来把握社会存在，而不可能以非理论的方式直接把握社会存在。既然不能以非理论的方式把握社会存在，那么经由何种理论才能把握社会存在？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便深刻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以经验论的方式或直观的方式看待资本，资本只会呈现出物质外观；以观念论的方式或先验的方式看待资本，便会关注到“资本成为主体”“资本自我运动”的外观，从而轻易地将资本与绝对精神画上等号，却遗忘了资本内在蕴含的对抗性与矛盾性。以实践本体论的方式或生产的范式看待资本，把资本理解为劳动的产物或“积累的劳动”，那么这种方式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为何高度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会生产出如此异己的资本结构，充其量只能解释雇佣劳动、异化劳动与资本逻辑的同质关系。无论以上何种理论架构，都无法抵达“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的理论深度。反过来说，当马克思把资本这种社会存在理解为关系而非物的时候，马克思把握资本的哲学架构必然溢出了以往的经验论、观念论乃至实践本体论等陈旧范式，而是一种新的理论架构。

（二）重构从德国观念论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

康德在认识论中提出的“先验统觉”同他在伦理学中提出的“自由意志”一道，“人为自然立法”与“人是目的”的命题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堪称“法国大革命的理论良心”。黑格尔通过追问“什么才是思想的真正客观性”，从康德的“主观思想”转向黑格尔本人的“客观精神”。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主观思想”就是英国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原则，一旦放任便会导致伦理实体的彻底解体，最终走向市民社会的终结。就此而言，黑格尔是“英国市民社会的理论良心”。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前提预先规定了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自由、平等、所有权”为基本原则、以原子化个体的抽象存在为前提的以“物的依赖性”或“普遍的需要体系”相联系的社会。然而，马克思的研究却发现，随着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方式，劳动者跟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发生巨大转变：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者跟劳动资料没有完全分离；而机器化大工业崛起导致了工场手工业的解体，进而导致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由此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化大工业的转型，直接导致整个社会从市民社会转化为资产阶级社会。在此特别需要重视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的“两条所有权规律的转化问题”。从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其实质是从市民社会转化为资产阶级社会。就此而言，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良心”。

从生产方式看，从德国观念论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便是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演进过程；从社会形式看，便是从启蒙社会到市民社会再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其社会存在便具有双重性：市民社会是其外在在表象，而资产阶级社会才是本质规定。在市民社会的表象界，人们看到的是商品的普遍交换，看到的是原子化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看到的是由所有权、平等、自由构建起来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基本原则；一旦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界，人们看到的却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剥削过程，看到的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看到的是经济社会权力对个体的强制作用。换言之，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原则性差异。无论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还是黑格尔“需要的体系”，抑或费尔巴哈“单个人的直观”，以及赫斯“交往异化”和蒲鲁东“构成价值”等，都没有超出市民社会的原则高度，反而沦为“市民社会的自我意识”。照此看来，马克思与上述思想的决裂，并非某个具体观点的差异，也不是单纯哲学思想的断裂，而是整个理论视域乃至哲学架构的兜底翻新，即从市民社会批判到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理论飞跃。

（三）马克思与流俗社会主义的差异问题

立足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性差异，便可理解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根本分野。蒲鲁东从“劳动平等”的原则出发，发现现实的社会状况是资本家凭借土地和资本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财富。这无疑是一种“盗窃”，违背了个体劳动者的报酬应与他们的劳动成正比的“平等原则”。表面上看，蒲鲁东的“劳动平等”与“所有权是盗窃”等思想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点非常接近，事实上，蒲鲁东的“劳动平等”无非是把劳动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原则，于是他的“所有权即盗窃”连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主张，都只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财富分配问题。蒲鲁东没有看到的是，“我劳动、我分配”的理论前提正是洛克的“我劳动、我占有”的劳动所有权原则。这意味着，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超出市民社会的视域和原则，尚未达到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高度。更重要的是，蒲鲁东没有看到，作为“我劳动、我分配”理论前提的洛克的劳动所有权原则，只存在于工场手工业时代，到了机器化大工业时代，资产阶级所有权不再是建立在自身劳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这意味着，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在机器化大工业时代注定是时代错乱的空想。蒲鲁东之所以陷入如此这般的理论迷误，是因为他的“劳动”仅仅是抽象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劳动”是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再进一步来看，蒲鲁东对“劳动”乃至其他经济范畴的形而上学理解，恰恰是以他对现实社会的经验论直观为前提的。正因为他以经验论的态度理解社会存在，所以他只能看到市民社会表象界的商品交换与财富分配问题，而看不到作为真实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更看不到由特定物质生产方式构建起来的社会权力和阶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绝非个案，蒲鲁东连同德国拉萨尔主义、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等，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分配问题，都以经验论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此意义上，这些社会主义流派都可视为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流俗社会主义”，这种对立不仅是分配抑或生产的视域上的差别，更是经验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上的差别。以不同的哲学架构把握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主张。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与流俗社会主义的差异也就具有了深刻的哲学意蕴。

长期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的问题，学界更多地关注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向互动，鲜有注意到马克思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如果说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从副本批判进入到原本批判的过程，即“消灭哲学”的过程；那么马克思对流俗社会主义的批判，即批判停留在社会表象的经验主义，这同时也是建构一种以批判性视角透视特定社会存在的内部结构与底层逻辑的“新哲学”的过程，亦即“重构哲学”的过程。就此而言，马克思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联、对流俗社会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研究方向。

（四）重思从《共产党宣言》转向《资本论》的思想历程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是何关系，这是目前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有研究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旨在揭示“一般物质生产过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而《资本论》则是旨在揭示“特定物质生产过程”乃至“剩余价值增殖过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理解又进一步发展出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定位为“生产逻辑”而把《资本论》定位为“资本逻辑”的观点，进而把这两种逻辑对立起来。如果“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相对立，那么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也是相对立的。事实上，这种相对简化的理解是以牺牲马克思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理论探索过程为代价的。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勾勒了英国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历史逻辑，由此表明物质生产特别是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的世界历史意义。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则深刻认识到，机器化大工业必将导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动，必将导致阶级分化乃至阶级对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当时世界仅有英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当时的法国依旧是小农占据人口多数的农业国家。马克思高度关注法国革命，形成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大量论述。马克思发现，法国的阶级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正是因为当时法国的经济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下。由于产业资本没有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呈现出各阶级高度碎片化、实力相对均衡、彼此利益矛盾尖锐的复杂图景，因而爆发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业化水平滞后

的法国革命轰轰烈烈，相比之下，工业化水平领先的英国却没有点燃阶级斗争的火种。英法之间的强烈反差，不得不令马克思反思《共产党宣言》的乐观结论。所以，马克思不仅从“两个必然”转向了“两个绝不会”，同时也从《共产党宣言》走向了《资本论》。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的重点是阐述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资本论》的重点即是揭示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完成了这一论证：即使一时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也必然因为利润率下降趋势而走向终结，即“利用资本限制资本”。所以，马克思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思想发展历程，也就是对从“外部革命”走向“内在批判”的过程。照此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只有深化，没有断裂。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共产党宣言》抑或《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在基本分析框架上始终是一致的，即“生产方式—财产关系—阶级格局—社会权力”的总体性框架。这也意味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并不存在根本逻辑的彼此对立。

（五）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对话问题

根据“生产方式—财产关系—阶级格局—社会权力”的分析框架，便可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回响，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深刻遭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848年后，德意志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断赶超式发展，整个德意志民族引以为傲的哲学思辨活动被经济建设和商业投机的狂潮所吞噬，乃至物质利益原则不断凸显，人的价值不断黯淡。这就引发了新康德主义的强烈反弹，甚至新康德主义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解为只注重经济利益的“经济决定论”。长期以来，新康德主义并未得到理论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事实上，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对新康德主义的回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这至少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围绕唯物主义问题的理论交锋，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物质问题的思考，由此开启了以“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经典教科书形态的塑造过程。在恩格斯之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所批评的马赫主义也是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新康德主义是人们思考经典教科书“物质观”乃至整个体系的重要理论语境。

其次，新康德主义直接影响了韦伯、齐美尔等思想家，进而也影响了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要注意到，随着泰罗制、福特制、“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的出现，西方进入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苏联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也呈现出组织化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的形式合理化过程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总体上呈现出主体与结构的紧张关系，批判主题从马克思的资本剥削批判让渡给抽象统治批判，解放方案也从阶级斗争方案转变为因应“普遍异化”的文化政治方案。也就是说，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可以视为“马克思与韦伯的合流”。

最后，更重要的是，新康德主义的“回到康德”直接影响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之所以陷入“伦理社会主义”困境，是由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所导致的。19世纪70年代，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重工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其“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的特性使其依赖高度组织化原则，而非轻工业所依赖的市场化原则。这一方面促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催生了现代信用体系，通过股份制与分红，工人通过非劳动性收入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同时，社会保障与政治权利的提高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工人阶级与国家利益深度绑定。于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革命，这构成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特别是修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从以上三方面来看，新康德主义的理论冲击及其效应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而这也正是思想纵深的關鍵地带。

（六）重估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史价值，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比较

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不再革命”的困境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却决定性地转移到了东方。这个转移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同样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样面对重工业的崛起及其带来的整个社会关系乃至阶级格局的深刻演变，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动向：资本主义

为了在重工业领域不断扩大再生产，必然要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就必然要不断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就必然要采取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政策，潜在的战争风险又反过来刺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大对重工业的持续投入。于是，帝国主义的出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列宁由此完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范式转换，他创造性地把《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框架，亦即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改写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民族斗争。于是，不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爆发革命，而是边缘的落后国家率先爆发革命。在此意义上，列宁完成了革命逻辑的东方翻转。“列宁转向”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民族斗争提升到了与阶级斗争相并行的世界历史高度。民族问题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缘性问题，而是关键议题之一。

在“列宁转向”之后，东方马克思主义便迈入了世界历史舞台。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大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分别展开研究。事实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饶有意味的对话关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比较研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值得期待的思想纵深空间。例如，自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社会的“滞胀危机”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从组织化阶段进入以弹性生产为基础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展开，构成了平行的“两个五十年”，而这正是透视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规定性。当代左翼所涉及的多元的身份政治、差异的社会接合、交往的商谈伦理、承认的规范诉求、公正的抽象讨论，依旧在形式合理化批判的延长线上，从而错失了“两个五十年”的根本性问题，这在哲学中就表现为批判理论的表象化，在现实中则表现为解放运动的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现代性的“时空压缩”的处境中，历经 80 年代的主体性解放与 90 年代的全球化、市场化浪潮，由此进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起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相信，“两个五十年”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增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识，也将产生一批富有原创力的思想成果，打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新格局。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往后做”，即从马克思到当代中国的理论史脉络的重新梳理，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纵深。只有完成这项严肃而艰巨的理论工作，马克思才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批判符号或一堆“死去的文本或观念的集合”，而是依旧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中的深刻理论。毕竟，深刻把握并领会当代社会存在的内在逻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这是由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所决定的。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马克思发展道路理论的哲学意蕴研究”(21DTR003)、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新时代的发展理论研究”(22JJD71000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梧，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创新发展

祁 涛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冲击之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一方面，新知识生产方式对于学术研究的传统范式影响深远，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知识的基础与研究方法论的更迭问题；另一方面，知识危机的背后又引发了人的存在危机。福柯曾经在《词与物》中论述，“人之死”与作为知识主体之死密切相关，因此，当前学术研究所面临的范式危机，必然指向全新的知识与